



教育理论

语文教育动态

徐明
编著

目 录

语文教育略谈	1
创造教育	12
改变学习方式	15
语文课堂教学的改革	27
大学的教育使命	31
道德权力	38
探讨高中阅读的教学模式	52
美国的初等教育	59
"3+X"感想	64
语文教材与教学改革	70
学习过程的重要性	76
国家、人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81
脑力的开发	102
中学语文教育理论	112
教育“多元化”	116
哲学性教育	121
教育的本质	135
教育存在的问题	143

语文教育略谈

多少年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一直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文学，文学在语文教育中一直背着骂名。“把语文课上成了文学课”——这是流行于语文教育界的贬义词。语言（言语）学才似乎是语文教育的正统；“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的口号一直“广泛深入人心”。五十年代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似乎是“语言”学派胜利了，八十年代的“语言文字训练”浪潮盛极一时，至今仍然热火朝天——这有对的和有效的一面，实际也是“语言”学派占据上风。看看我们的教材，基本是以语言学的路数和体系编写；听听我们的课，基本是以语言学的“招数”分析文学作品；翻翻我们试卷，基本是以大学语言学系的标准和方法来编拟试题。有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自建国以来，语言学界和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的干预远远超过文学界和文学家的干预。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是语言学理论一统天下，或者更直接地说，现代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理论，是奠定在语言学理论的根基上的，而这个理论又是十九世纪的静态的语言学理论！

建国后，是经济建设、富民强国、阶级政治斗争之“用”。一切能立竿见影用于上述目标的部门、学科才能得到大发展，而远离上述致用目标的部门和学科，则不能得到发展，或抑制其发展，或令其“异变”成纯粹致用的部门、学科。相比而言，语言与文学，那个更有用呢？当然是语言，语言是交际之用，须臾难离，无论参加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人才，还是参加经济建设的

人才，语言对他们是最重要的。文学，则是消遣的，高雅的，无论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还是于经济建设，均无法直接致用。中小学的主要任务也是培养“急功近利”的社会“致用”人才，语言用得上，文学离得远，似乎可有可无。而且，文学是致于人的“内在精神”，而语言则是致于人的“外在交际”，当然后者重于前者。所以，教材编选时轻视文学，即使选文学作品，也不是以审美的眼光选那种真正能够陶冶人的精神和性情的以艺术取胜的篇章，而更多的是用“致用化”（尤其致现实政治之用）的眼光筛选过的、剪裁过的文学作品。对这些文学作品也仍然是用“语言学”的招数和方法来讲析，（再加上用“兴无灭资”的话语来阐释其内容）。

其实，文学之于语文教育的作用，功莫大焉。可以说，一切语言（言语）教学，离了“文学化”的教学方法，简直寸步难行。高超的语文教育的艺术，完全是借助于文学的；基本的语文教育艺术，同样是离不开文学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能体现语言价值和语言真谛的，是文学；最能负载语言价值与语言真谛的，还是文学。一句“苍黄的天底下，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这是语言学的，还是文学？让孩子用“种”造句，孩子说“孙中山种了中华民国，毛泽东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语言学，还是文学的？

鲁迅、郭沫若一代人曾大反文言，叶圣陶先生似乎也不大赞成学文言。或者干脆说，自五四后，一直到本世纪80年代，学文言一直受到整个社会主潮的阻扼。少学或不学文言，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因此，尤其建国后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或极少，或干脆没有。

为什么反对学文言呢？大概意思有三：1.文言中有许多封建思想糟粕，它在“封资修”的名单中排头号，与现代的政治文化思想相抵牾；2.文言是僵死的东西，禁锢学生的思想与精神；3.文言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其实，这是十分肤浅的。文言中有糟粕，但更有精华。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大师，以文言构筑的诗文，那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足以照彻千万年，足以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璀璨的精神历程，我们再通过“文言”，去“循迹走过”，对我们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走过”、不断“历练”，就是我们的精神“积淀”、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记”与“精神传承”！

文言与白话，是母子关系，根叶关系。白话绝大部分来源于文言，大部分双音节词是文言的附缀、演绎而来；绝大部分的鲜活的成语，源自文言典故。无母哪有子，无根哪有枝叶繁茂！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整体的语言表达水平，有日益下降的趋势，传媒及文化人的语言表达失去典雅与古风，变得“浅白化”“粗俗化”，——这实际就是整个社会轻视文言、文言教育的血脉被切断的恶果！

鲁迅、郭沫若一代人反对文言，自有他们那代人的历史文化背景。因为生在五四前，他们是在文言的“酱缸”中浸泡过的，他们的每个毛孔中都有文言的滋养；也就是说，他们的文言的根底，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无论怎样反对文言，他们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的文言的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鲁迅“‘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

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

（董桥）而我们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甚至六十年代到七十、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很少或根本没有一点文言的根底的情况下，如果也跟着鲁迅、郭沫若一代人的余音，再去反对所谓的文言，不是头脑发昏，就是瞎起哄！哄来哄去，“哄”掉的是几代人的文化学养，“哄”断的是民族的文化血脉，“哄”塌的是中华文化的精神之一——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自五四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总体思路，就是四个字——“举一反三”。什么是“举一反三”？就是每学期以“二三十篇文章”为“例子”，对例子进行非常“科学”细致地“拆解”、深入地“鉴赏”、精心地“把玩”、反复地“历练”，以此来达到让学生“循例”学会听说读写、“循例”自能“繁衍”大量语言（言语）的目的。前面师生对二三十篇“例子”文章的拆解、把玩、历练，就是“举一”，之后学生“循例”自能“繁衍”大量言语就是“反三”。“举一”，讲究求甚解、深解，不厌其深、不厌其细、不厌其透，一篇文章讲它三四课时不在话下。“举一”的目的在于“反三”，让学生通过这个“例子”，看看怎么

运用语言。“举一”是数量少，“反三”是数量多。每学期最多 30 篇文章，1 年也就 60 篇，中学 6 年最多也就 360 篇。试图通过 360 个例子的学习，让学生“繁衍”远远超出 360 篇的言语。因此，“举一反三”的妙蒂就在于“以少胜多”。讲 360 篇文章是“举一”，学

生生成、繁衍更多语言是“胜多”。

仔细考察这种“举一反三”的现代语文教育总体思路，实际就是一种完全科学化、理科化的路子，学习数学、物理学、化学的路子。学数理化等理科课程，不就是“举一反三”吗？教材或教师讲深讲透一个例题，后面就附着相当数量的习题；学生学会一个例题，就会做数量相当多类似的习题。这种总体思路，有一定成效，但成效不大，几十年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一直在少慢差费中徘徊，与此有关。

其实，大量的研究、实践以及常识告诉我们，语言（言语）的学习规律，恰恰是“举三反一”。语言学习不太类似于“科学化”的数理化学习、可以“举一”（如例题）“反三（做习题）”，“举少”而“胜多”。语言学习常常是“举三”而“反一”，“举多”而“胜少”，“举十”才“反三”。人类语言的学习，是在“巨大数量”的语言（言语）的“例子”的反复撞击、反复刺激下，才点点滴滴“说出”，成年累月数量再无限地加大后，才“奔涌而出”。因此，数量的巨大，例子的极大丰富，才是形成语言（言语）能力的最首要的前提条件！婴儿学口语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孩子呱呱坠地时，一言不会，1周岁左右说出最简单的“妈、爸、水”语词，2周岁左右就能自如运用语言，说出奇妙的句子。为什么口语学得这么快？效率如此之高。因为他接触了“天文级数量”语言（言语）的“例子”！以平均每天听大人100句话计算，每句话10个字，每天就是1000字，一年365天就是365000字，两年就是730000字！那就是说，孩子学会口语，等于两年“读”（用耳）了五六部长篇小说！我们学书面语，中学六年

语文教材才多少字！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语言学习的规律是决不是“举一反三”，而是“举三反一”，现代语文教育总体思路必须彻底改变！

自五四后，西方“科学的东西”引入到中国，引入到语文教育之中。这些“科学的东西”有，西方的语法学、写作学、文艺理论学、阅读学乃至文章学、词汇学等，还有诸如所谓“新三论”、“旧三论”的东西等等。这是好事，对语文教育的规范和科学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而，本世纪以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出现了区别于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奇观，就是出现了“讲深讲透”、“析细析微”的现象，西方化的语法学、写作学、阅读学等等知识，大量地进入到中小学语文课本之中，不仅仅是西方语法学、写作学、阅读学等“知识”的进入，而且是整个西方化的、所谓科学的教材“编写体例”的进入、西方化的“教材讲授方式”的进入。甚至在小学里，一篇《登鹤雀楼》也能洋洋洒洒分析内容 20 分钟（张志公语）。

叶圣陶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说：“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论方面比以前注意得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功夫太少，多数学生只是看看而已。这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惟有不忽略讨论，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面不偏。吟诵的时候……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这是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叶老先生这段话，是针对四十年代的情况说的，四十年代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呢？熟悉中国现代语文教育

现状的人知道，这种“重分析、轻吟悟”的状况，愈演愈烈。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了呢？也可以说，仍并无大的改观。请各位注意，我并不反对“理法”的分析，不主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全盘吟悟。我是说吟悟这种中国传统的颇为有效的语文教育方法，与来自西方的所谓理法的分析相比，在成效上绝不比它差，甚至有时远超过它。

为什么把我们民族自家的、这么好的语文教育的“看家本领”给丢掉了呢？我想，说透了，这实际是自五四以来的一种泛化的崇仰西方科学的民族自卑心态所致。五四后，似乎各行各业、各门学科，一切都讲科学，都讲理性分析，讲分解和所谓的“解构”，似乎语文教育不讲这些、不引进这些，就是落伍的、低效率的。未来中国语文教育，应该拣起这个丢弃“宝贝”了！

人的语言（言语）能力的学习、语言（言语）能力的形成，其实主要是依靠对前人经验的一种模仿；且基本是一种“不求甚解”的模仿。因而背诵在语言学习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语言能力的形成，当然需要“理性”的参与，需要“理法”（如语法、写作法、文章学等）的帮助，有时这种“理性的参与”、“理法的帮助”还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譬如弄清结构、分清层次、总结归纳等等。

但是，背诵，对语汇材料的积累、对整体文句的感性的积累，所起的作用比抽象的“理解”，所起的作用更大。背诵，是化别人的语言为自己的血肉。那文句、那意境，萦绕心头，如发于己心，如出于己口。愈积累愈丰富，愈丰富愈自然贯通，逐渐就积淀成一种语感了。中国传统的语言教学，最基本、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

方法，就是背诵。巴金先生能够背诵 200 篇的《古文观止》，茅盾能够背诵全本的《红楼梦》，这是他们作为文学家有着超人的语言能力的重要原因。

要大大提高中国语文教育的实效，在不丢弃适当分析、例子、理法的前提下，非重视吟悟、数量、背诵不可！

翻翻我们的教材，散文（广义的）占了 90%，诗退居到了 10%。（我这里说的诗也是广义的、宽泛的，那种虽以散文的体式写成，但内核具备诗的精神，也是诗。）对现代诗选得少，对古典的诗选得也少。语文考试也有个流行的不成文的禁令，那就是作文不能写成诗。

这是否也跟当代中国社会的大的政治文化心态直接关联？这个大的政治文化心态就是——实用。实用，从大处说，是国家的政治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小处说是人际交往。而散文是广泛应用的文体，而诗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无可利用”。

可我们是一个诗的国度！我们有着几千年的“诗教”传统，“诗书传家”——不但可用之于家，还可用之于国。孔子甚至说，不学诗（诗经）无以言。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的诗歌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诗，是中华文化精华中精华，是中华文化宝库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古代文人，写诗抒怀，以诗筹答，以诗相赠，是平凡生活中最平凡不过的事。可现代当代的文人（广义的），还有多少能写诗！即使能写诗，可又有多少人能够写得好诗，实际情况确是“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说，中国诗教的薪火已经快没有传人了，快要熄灭了！追根溯源，这不正是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一个悲哀吗？

其实，从少年儿童自身的特点讲，诗最接近于他们的性情，最接近于他们天真烂漫的心灵。干脆说，孩子天然就是诗人。三五岁的孩子脱口说出“天空中有美丽的动静”这样的话，这不是诗是什么？这是“天然去雕饰”。中国今天的孩子，诗的天分还没有得到任何发展，就在语文课上被老师们按着头去学“实用”性、“交际”性的所谓散文，这无异于摧残、扭曲。退一步讲，即使为了“实用”、“交际”，通过具有神奇想象的诗来学语言交际，成效其实更大！

诗诉诸于人的“内在精神”，散文诉诸于人的“外在交际”。我们不能只顾实用性的交际，而荒芜了孩子的“精神”。

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太重了，它太庄重，太沉重，太峻严！一直以一副峻急严厉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

教材的内容：社论、领袖的报告、领袖的故事、直接阐释时政观点和政策的文章，太多地充斥于我们的教材之中。相反，谐趣的、幽默的、亲和于人的文章，你能从小学到高中的 24 册语文教材中找出几篇？对比一下英国人编写的《新概念英语》和中国的语文课本，同是语言教材，哪个更有趣、更有人情味？其实，中国的文章中有许多是诙谐有趣、循循善诱、和言悦色的，诸子百家中有许多寓理于诙谐幽默、于日常情事之中的妙文。这是中国文章的一个传统。我们古代有《笑林广记》，现代也有老舍（如他的《老张的哲学》）、钱钟书（如他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更有当代的王蒙（如他的《冬天的话题》《坚硬的稀粥》）、王小波（如他的杂文）。他们都是文章大家。可课本均不收。

课文的阐释：对现行教材中所有课文的解读和阐释

也太庄重。我们现行教材中，许多篇目中都有幽默诙谐成分，但是我们却大大忽略了、视而不见。如《拿来主义》、《文学与出汗》（已删）、《茶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甚至“山药蛋派”的赵树理的作品，均有不少谐趣在。可《拿来主义》只成了“批判卖国主义和怎样继承文化遗产”、《茶馆》只成了“送走旧时代”、《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成了《红楼梦》的“阶级斗争的纲”。原本是幽默小说的《警察与赞美诗》、幽默占绝大成分的《变色龙》、《高祖还乡》，对其诙谐幽默成分，我们也都从轻淡然处理，以“兴无灭资”“息封灭资”思想正襟危坐着来阐释。

教学方式：我们中国的语文教师还承担着一个所谓的“因文解道”、既“授业”又“传道”特殊任务，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师，每备一堂课，都要自觉地“崩紧一根弦”，想方设法从哪个环节上加以“传道”；一走上课堂，都自觉不自觉地要庄重起来、严整起来，换一副面孔。如此，面对庄严的教材、庄严的“道旨”、庄严的文字，再加上中国教师自古古板庄严有余、师道尊严意识根深蒂固的传统，师生们怎敢潇洒、怎敢诙谐！语文课怎敢“散开怀抱”、怎敢让心灵飞翔！

教育出的孩子：我们“庄严”的语文教育体制下教育出的孩子，写出的文章、说出的话，跟小大人一般，沉稳老成，老气横秋，甚至千文一面，很少有人会在文章中“幽他一默”，来点诙谐，加点调侃，妙趣横生的文章更是罕见。当今优秀作文期刊和书籍铺天盖地，但是真正纵情挥洒、谐趣为胜的作文有几篇？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十几年的课堂上，学的是教师用“庄严”的方式讲授的“庄严”之文，并且把写文章看成是正襟危坐的、

十分庄重的事情，写文章关乎国运、关乎民生，绝对玩笑不得。因而孩子们摊开作文本面对方格稿纸时，便不自觉地“峻严”起来了。再想想，几十年来，中国的文人也太沉重了，中国文人、作家能够写诙谐幽默、嬉笑怒骂文章的，也不多了；即使写出来（如魏明伦、王小波、王蒙、李敖等），也大多被主流意识所排斥，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认为是“逆流”！

我们的孩子写“庄严”、“神圣”乃至慷慨激昂匡时济世之文，多是行家里手，如流水般立笔成文，但几无“怀抱真言”，或编好人好事、或假造高亢之辞，均是由课本学来的“伪神圣”之论和社论文风，为“庄严”而藏起自我的谐趣，为“神圣”而隐藏自我的平凡。这是一股矫饰文风，扭曲孩子灵魂、戕害孩子精神！

我想，以上这些，是否跟百年来中国人“民族救亡复兴”的巨大思想压力和精神压力有关，跟当政者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的大旗下，禁锢个人精神自由和情感自由、禁绝个人志趣的伸展有关？百年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中，确实一直存在一个“精神气度”问题。百年来，中华“民族救亡”形势的严峻和“民族复兴”重任的沉重，蕴成一股无形的强大精神氛围，再加上人为的专制特色的文化空气，如巨石般压在现代中国语文教育身上，使得它的“精神气度”一直那么峻厉、狭仄、沉郁，缺乏一种雍容、宽宏、自由的风范。

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一直高高扬起“语文教育为现实应用”这面旗帜——建国前语文教育为民族救亡之用、建国后语文教育为民族复兴之用。我们呼唤，语文教育中多一点平凡、多一点谐趣、多一点自由、多一点真？

创造教育

创造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法。创造教育最能开发和激励人的创造潜力，培养和强化人的创新精神，并使人的创造潜力和创新精神通过知识、技能与社会实践的中介，逐步地有序地转化为主体创新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最终表现为高度的智慧和发达的经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加强创造教育，并将之注入素质教育的机体与机制之中，以便培养出适应高科技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所特需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自从德国哲学家、教育家赫尔巴特在 19 世纪初提出把数学作为教育的主要手段以来，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教师讲授为中心，以教科书正本内容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便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趋势。这一方面为教育走向规范化、有序化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地命名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陷入呆板和单一，不意之中抑制了教育机能的创造因素和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

人们大约都有这样一种体验：坐在同一教室里的学生，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其实是不大相同的。他们各有各的特长、素质、基础、能力、兴趣、追求等。面对如此纷纭万状的知识接受者，一律采取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统一的讲课内容和讲课方式、统一的考核标准和评鉴尺度，其结果是难免要抑制个性、削平特长、束缚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造热情。

创造教育的实现过程,也就是教人发现真理的过程。这里所说的教人发现真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启发、诱导、激励人们去探索、开拓、发现、创造,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个性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与特长,用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缔建灿烂的事业和建构辉煌的人生。毫无疑问,这样的教育是具有创造学内涵和创造新精神的教育,它不仅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才成长的规律,而且也是实现教育效益的最佳境界和培养顶尖人才的最佳手段。然而,传统的教育模式却往往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究其原因,主要是凝固化和不大统一的教材、教法、教学机制和教学模式,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抹煞了学生的个性和限制,学生的创造力。

创造能力和创新意识尽管在传统教育中容易被忽视,但它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却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它不仅是一切知识和技能所开出的鲜艳花朵,而且是一切“教”与“学”所结出的最终果实。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主要在于使受教育者能够有所创造,而只有通过创造,知识和技能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产生社会效益。欧文·泰勒之所以把创造力的形态和质态概括为表达式创造、生产创造、发明创造、革新创造和深奥创造等五个层次,也主要是从这一点着眼的。至于中国现代大教育家陶行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更深邃、更明睿了,他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须看他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生活工具主义之教》)他甚至发表《创造宣言》,大声疾呼:“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意识，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那就是增强创造新意识，加强创造教育，大力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发挥学生的创造天才。并切切实实通过教育功能逐步使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成为实现经济发展和进步的不竭动力。

一般来说，由于创造教育注重使学生在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自觉加强提取、加工信息的能力和从多种设想方案中进行选择与决策的能力。所以，就避免了传统教育所施行的只让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单纯储存、积累知识和信息，只给学生一个现成的和唯一肯定的标准答案的缺陷。由于创造教育注重对学生发散性思维的训练，把学习过程变成思维、探求、启悟和实践过程，把单纯的接受知识变成同时也“生产知识”，这样以来就避免了传统教育所实行的只让学生进行集中思维，只提供结论性的东西，只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等缺陷。由于创造教育强调教学的差异性和变动与发展，强调诱导、启悟和富于个性特色的独立思维，强调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展示，强调对学生进行高标准的单项突破和对未来社会的应变能力，从而避免了传统教育的那种在强调教学统一性、规范性、模仿继承性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低标准的全面平推，漠视社会的现实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只求学生以不变应万变地消极适应当今社会的缺陷。

其实，创造教育的特点和功能，还远远不止于此。它的真正魅力，更在于它所兼具的探索性、开放性、发散性、未来性、选择性、判断性、决策性、实践性、差异性、应变性、发展性、主动性和进取性等，为培养造

就适应时代要求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的创造型人才，提供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思维方式、认识方法和精神素质。具有了如此思维方式、认识方法和精神素质的人，乃是大可以进行海阔天空、纵横驰骋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劳动，同时也大可成就出典超范、独具风采和闪射时代光华事业的。特别是由创造教育所衍生出来的智力激励法、差别变换法、仿生创造法、性格设计法、心理联觉法、造型变异法、色彩构思法、竟象造型法、组合变换法等极富创新意识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法，更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所需要，也更为造就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创造型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和广阔的舞台。

我们必须认识到时代、生活、改革、发展对教育人才所提出的新考验和新要求，我们更应当认识到在这些新考验和新要求中占据重要位置和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创造教育本身就是素质教育的题中之义，创新精神本身就是改革精神的刃上之锋。

孕育和激发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活性土壤是什么呢？这就是创造教育。

改变学习方式

人类的学习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而获得经验的文化活动。在当代信息社会中，由于知识、信息量的不断增长，每个人要能积极地作用于环境并发展自身，就需要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的生存可以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学